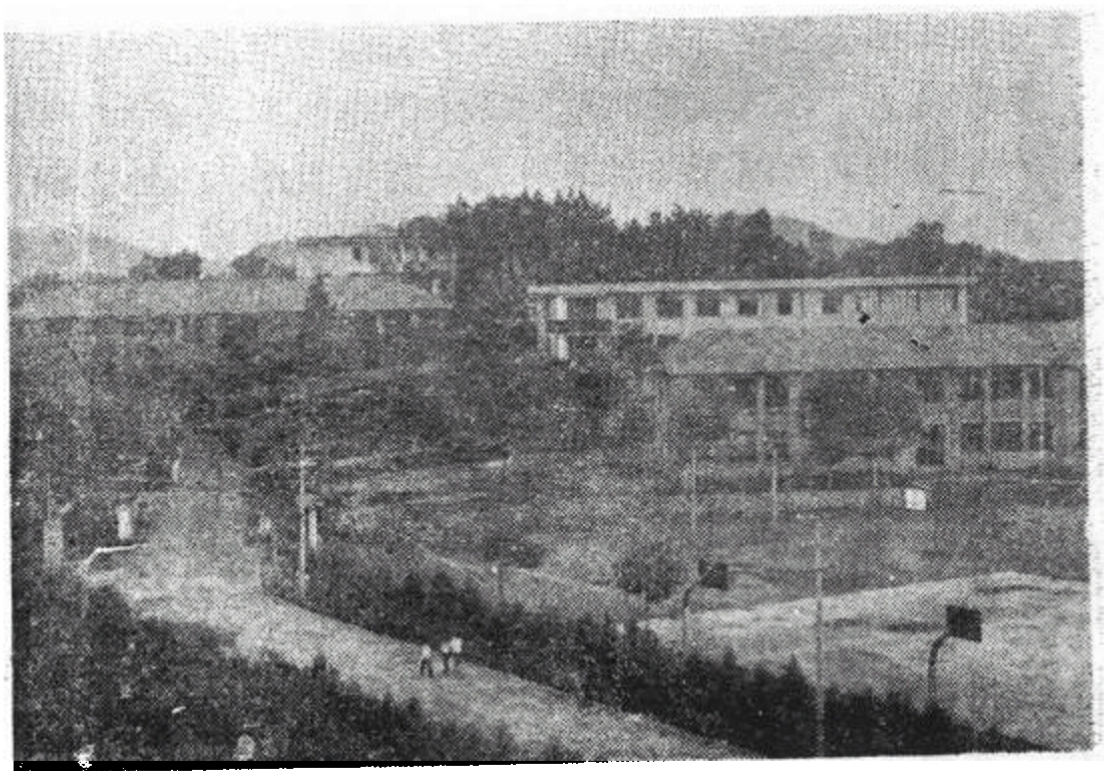


社会贤达创办暨阳中学

蒋玲德 冯泉新

周金鑫 徐红钢 周锡苗



诸暨中学新貌

诸暨中学迄今岁星七十有八，可谓源远流长。其一脉为诸暨县私立暨阳中学，此源头可上溯到利普战时补习中学。创设补习中学，改办暨阳中学，时逢抗战军兴，烽火遍起。戈甲不息、濒危而后安，黉府弦诵，几绝而仍续。能历尽劫

波而欣欣向荣，实赖周子豪、翁国华、蔡禹译、蔡泽安诸先生及其同仁艰贞卓绝之行。先辈创业，泽被后世，后人受惠，当不忘先人风范。

诸暨乡风，耕读传家。早在1912年即创办诸暨县立中学堂。1933年县立初级中学(即原中学堂)改办诸暨县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。此后，凡要求升入普通中学之高小毕业生，除远涉沪、杭、宁、绍等地而外，别无门径。抗战事起，沪、杭学校，相率停办或内迁。于是莘莘学子，徒叹向隅；学生家长，或因交通阻塞，或因经济困难，或因惧遭战火，皆视子女远出求学为畏途。因此，失学者竟数以百计。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，欲救民族危亡，求国家振兴，必须依赖教育。青年学生实为国家命脉之所系。有鉴于此，当地有识之士、社会贤达痛感失学青年之苦，便有筹设普通中学之倡议。



斯夔磬

1938年8月1日，璜山区区长祝更生及地方士绅、翊忠小学校董会之斯烈(字夔磬)、周子豪诸君，借区立翊忠小学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，议决在湮浦镇设立利普战时补习中学，并公推周子豪先生为校长，准予招生开学。经多方联络，是年8月21日于翊忠学校纪念厅举行临时会议，商讨筹设补习中学事务，与会者三十人为补习中学发起人。发起人中有诸暨籍闻人蒋鼎文、宣铁吾诸先生，亦有本地名流斯烈、周子豪诸君。是年9月4日，补习中学筹备会举行第二次会议，联名具呈

县政府转浙江省教育厅备案。并向翊忠小学借东首各教室为补习中学校舍,请张志雅先生协理校内事务。翊忠小学的前身为翊忠书院,名扬遐迩。近代著名学者蔡元培、徐锡麟曾来校讲过学。是时选翊忠为补习中学之校址,实是地利之所。



周子豪

周子豪(字伯雄)生于1876年,卒于1954年,诸暨舞凤乡尚典村人。早年留学日本,就读于明治大学。回国后,曾任杭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等职。1938年8月出任利普战时补习中学之校长,开始其中学教育生涯。创办利普战时补习中学,除借用翊忠校舍一隅,几乎白手起家。开学翌年,学生骤增至三百余人。学校为筹措经费,添建校舍,成立了一个劝募经

费委员会,开展募捐工作。劝募经费委员共四十五人,他们走村串户,四处游说,总计募得学田一百余亩,国币三千四百余元,以及毛竹、石灰等实物。其时,周子豪先生不仅组织募捐,还躬亲筹捐。除募得学田外,还筹得国币一千七百余元,居各经募人之首。于是添建膳厅五间,教室、浴室一一增辟,学校基础,赖以稳固。再者,利用学田产息及募得款项,学校千方百计购置校教具、实验仪器,加之募捐所得及经县政府核准,向县农校借用之仪器,终于得以敷教学之用。周子豪先生及同仁善于谋划,集腋成裘,孜孜努力,“勤启山林辟草莱,化城弹指见楼台”,创设补习中学,付出了辛劳。

办学伊始,条件维艰。即便如此,周子豪校长仍以高薪及优厚待遇聘请名师。如,年逾古稀、满腹经纶、曾执教于

公立绍兴中学的老秀才何震川先生，原任杭州高级中学教务主任的潘锡九先生，编著《人道浅说》的蔡禹泽先生，著有《代数》一书（由中华书局出版）的蔡泽安（时用）先生，著有《几何》一书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）的石超先生等等。有如此众多的良师执教，严谨治学，故而创办不久，学校名声大振。除本县外，嵊县、萧山等邻县学子慕名而来求学者，络绎不绝。

利普战时补习中学，崛起于抗战之际，生存于战祸之中。1940年10月16日，日本侵略军第一次进犯，县城沦陷。同月18日，敌机轰炸湮浦，学校被迫停课，至11月1日，县城光复，始得复学。接着，周校长致力于扩建校舍。于1941年1月至3月，购地新建校舍一座，又在湮浦镇租毕氏宗祠为第二校舍，以供教学急需。1941年4月15日深夜，日伪军再次窜入湮浦，留校教职员和道远不及疏散之学生，及时转移，于次日集中在网山小学及月龙村蔡泽安先生宅中。不料另一支日本侵略军自嵊县夹击，师生不得不避入深山丛林，直奔永康县境。至6月下旬敌退后，师生才返校复课。1942年4月，日本侵略军第三次进犯，窜入湮浦，肆意烧杀，补习中学校舍亦成了日本侵略军残杀无辜平民百余名之屠场。利普补习中学的办公室、教室、师生宿舍等大半毁于大火，几乎无以为继。在学校处于危急存亡之关头，周子豪校长临危不惧，克服重重困难，设复兴补习中学办事处于陈蔡村，到42年8月租赁陈蔡村陈氏和蔡氏宗祠及红梅孝子祠为校舍，继而复学，经周校长和蔡禹泽诸先生努力，两年后始复旧观。

日本侵略军三度进犯，使办学艰险万状，周子豪校长率领师生临危不乱。早在日军入侵前，他多次召集应变会议，

设计生存，藏学米，搬教具，决定暂时停课、疏散学生，以减少损失。离乱中，组织教师与学生共患难，组建临时学生营，借校舍继续学业。即使风餐露宿，仍席地上课，弦歌不辍。危难之际，周子豪校长仍不忘将补习中学转为正式中学。早在1940年11月24日，周子豪校长就召集本校创办人、各界人士，提议将补习中学改为正式中学，决议先行组织筹备委员会，聘请校董，促进正式中学之成立，为以后暨阳中学之诞生奠定了基础。

1943年3月，周子豪校长终因丧子之恸，目疾加重而势将失明，才辞去校长职务赴沪就医。周子豪先生虽已离任去职，仍耿耿难忘一手创建并共患难达五年之多的补习中学。他在沪带病募捐，购置理化仪器及生物标本，并于1945年5月亲自护送到校，为利普战时补习中学之发展尽心竭力。1948年，暨阳中学校庆十周年之际，周子豪老先生还赋绝句二首，以志祝贺。他虚怀若谷，毫不自矜，却以勾践复国之典故勉励后学，兹录第二首以表达对周子豪老先生之不尽怀念：

十年教训遂沼吴，
树人端本是诗书。
莘莘学子皆梁栋，
将相何曾属狗屠。

利普补习中学时期，与周子豪先生共谋划、同患难的，首推蔡禹泽先生。1939年2月9日，蔡禹泽先生被公推为校务主任。时周子豪校长负责大政，具体繁琐之校内杂务皆由蔡禹泽先生总理。细者如学生不和、出入钱粮、师生吃宿，巨者如捐募财产、购买地皮、修房造屋、迎送省厅主试委员及当地

士绅，皆由他主管。为保证教育质量，促进补习中学的发展埋头苦干。尤在战乱时期，应变事宜，迁校复学，事务繁杂无比，亏得蔡禹泽先生精心料理。他还编讲义、著教材，兼任数学、公民等课的教学业务，在师生中威望很高。直至暨阳中学行将成立，蔡禹泽先生才辞去校务主任之职，但他仍顾问学校，为暨阳中学之改设竭智尽力。周子豪校长离任后，当地士绅敦请翁国华先生代理校长，以图久远。



蔡禹泽



翁国华

翁国华（字振夫），生于1897年，卒于1944年，诸暨县陈蔡白果树下村人。少年时失学，学做裁缝，饱尝缺少文化之辛酸。后发愤努力，毕业于陆军大学。曾任国民党军队独立旅旅长，授少将军衔。抗战爆发前退出军界，回乡安居。翁国华先生乐善好施，正直耿介，深孚家乡民众之望。翁国华先生曾捐资兴办网山小学，利用陈蔡大圣寺创办“大圣医院”，以教育子孙后代，方便百姓治病。因此，当时璜山区区长祝更生将镌有“万家生佛”之匾额一方相赠，由此可见翁国华先生之为人。

1943年3月，翁国华先生代理校长后，为图学校的长远发展，即联络四乡人士，组织校董会，积极筹划改设初级中学，以实现周子豪先生之宏愿。一俟同仁赞同，即定校名，并向浙江省教育厅呈文。是年5月，校董会奉省教育厅指令，准予备案。8月，翁国华先生又呈文省教育厅，添设高中补习班。仰翁国华先生及诸同仁之努力，迄9月，复奉省教育厅之令，准该校正式开办，同时领到“诸暨县私立暨阳初级中学”之校铃。暨阳中学之得名与创立，是时正式开始。命达，翁国华先生任校长。翁国华校长即兴亲笔书题校牌，以志庆贺，全校师生莫不欢欣鼓舞。借此东风，翁国华校长整肃校纪，严格校规，并以身作则，每天办公自晨达昏，食宿在校，与教师共商治校大计。他对学生学业严加要求，日常行为严加规范，并要求学生多才多艺。翁国华校长极关切学校的设施，不断添置校产、开辟体育场，借用陈蔡四所祠堂，以供教学之用，使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。当时，日本侵略军的驻地与陈蔡村仅距二十多华里，且陈蔡为全县政治、军事、教育之中心，敌人时有“扫荡”之举。翁国华校长除忙于校务外，还时率全体师生疏散迁徙，以免遇“扫荡”之祸害。办学如此艰难，暨阳中学不仅不休校，反而规模日益宏大，学生增至500多名。

办学难，办私立中学更难。若与公立中学争晖，首先须有一批施教有方的良师，翁国华校长为延聘名师而煞费苦心。他亲定聘师标准，制订教职员任职资格条例，选聘时，将十多门科目的任课老师，分为普通科与职业科两类。前一类标准六条，其基本条件须为国内外专科学校或专门学校的本科毕业生。后一类标准五条，其基本条件为职业师资训练机关毕业

者，还特别重视“职业经验”。凡属有名望、有实学的老师，翁国华校长求贤若渴，多方设法，百般求谋。抗日烽火燃起后，一些诸暨籍在外任教的学者、名流纷纷归家避难。翁国华校长乘此机会，四方寻讯，逐一延聘，并以高薪厚遇教师，使他们更好地造福桑梓。当时办学条件艰苦，但受聘教师月薪以稻谷计都在三百市斤以上，还差人送到教师的家中。教师的生活由工友侍奉，包吃包住，千方百计改善教师的伙食，使大家安心工作。翁国华校长重才识才，知人善任，恭敬名师，与教师亲密无间。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盛名之下，众多学者投奔暨阳中学执教，师资阵容煞是壮观。张韶九、何震川、石超、章乃羹、潘锡九、蔡泽安、赵邦伟、陈望斗、何广大、徐颂周、蔡禹泽、毛颖甫、蔡雪亮、葛禹田、徐世俊、斯颂远……，皆教名卓著，如群星灿烂，汇集于暨阳中学。他们乐育英才，成绩斐然。

翁国华校长掌校期内，进一步劝募学田，以实校资。据载，城区镇孙钦亮(采丞)先生捐田计二百零二亩一分，湮浦乡盘山村蒋鼎文先生捐佃田一百零六亩，后又续捐田九十九亩九分六厘七。对凡有余力资助者，翁国华校长亦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且凭籍其威仪，每使对方乐助，为家乡教育事业尽心尽力。凡乐助者，都设宴相待。翁国华校长在任期内，共募得学田七百余亩，巩固了学校的根基。而他本人从不图私利，不取分文薪金，所有事务，皆为义务。

1944年3月10日傍晚，翁国华校长于离校回家途中，不幸身亡，全校师生闻凶讯而大恸。在当时举行的追悼会上，章乃羹先生所撰诗文，代表了全体师生对翁国华校长的赞颂。诗颂曰：翁国华先生“扶颠持危，身殒名留，丹心碧

血，完此金瓯”。1947年校董会议决定，定故校长翁国华先生忌日为暨阳中学建校日，以志故翁校长于学校之深恩。翁国华先生受命于危难之际，立事于多事之秋，为改创暨阳中学，充实设备，增添班级，加设高中，延聘名师，捐募学田，稳固基业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，后人永志不忘。

翁国华先生惨遭不测后，在校教职员临时组成校务善后委员会，公推蔡禹泽先生为主席委员。蔡禹泽先生再次主政校务，为暨阳中学之绵延不辍又立汗马功劳。后聘郑奠先生为校长，半年后又辞职。是年12月，校董会聘请蔡泽安先生掌校。一年而三任，可见其时办学之艰难。暨阳中学之中兴，有赖蔡泽安校长之努力。



蔡泽安

蔡泽安（字时用）先生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，曾任县立中学堂校长多年，擅长算学，著书立说，教育学生游刃有余。平易近人，不威而严，深得师长敬仰。他受命于危难之时，策进校务，不遗余力。继业守成，实属非易。蔡泽安校长对内日求进步，对外力谋发展，为暨阳中学向诸暨城关发展，立下头功。

抗战胜利后，蔡泽安校长募集资金，修复翊忠旧产。同时，为求暨阳中学之长远发展，他在城关物色合适处所。诸暨城内北门之茧厂，系城关耆绅孙锡鋆先生之私产。抗战时，日本侵略军在此厂内架设铁丝网，建筑炮台，厂屋已破败。蔡泽安先生凭籍与孙锡鋆先生之笃深交往，专程亲往省垣，商之于孙锡鋆先生。承孙锡鋆先

生热衷于家乡教育，慷慨允诺丝茧厂捐赠给暨阳中学作校舍。师生闻之，莫不雀跃。1945年寒假，赶修与搬迁并举，本部与分部遂分。自此，暨阳中学迈出了发展之一大步，为此后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使暨阳中学担负起全县性中学之使命。



暨阳中学旧址

1946年7月，徐颂周先生接任校长之职，进一步致力于改办完全中学，扩充校舍，充实设备。建智斋，筑仁斋，暨阳中学向智度山发展。后陈望斗先生主持校政，动员智度寺僧，随智度山百余亩山地并入学校，为暨阳中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智度山四周旷地纳入校园后，初具了现今诸暨中学形体。1956年改私立为公立，改暨阳中学为诸暨中学。发展到今日，诸暨中学设初、高中班级三十多个，教职员工142人。学校建筑面积达一万九千多平方米，可谓规模

空前。诸暨中学承前启后，发扬优良校风，尊师重教蔚然成风。桃李满园，硕果累累，教育质量引人瞩目。1979年被定为浙江省重点中学，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。

抚今追昔，饮水思源。日见校园高楼耸立，绿树成荫，湖光鳞鳞，也不以为奇。回思暨阳中学兴学之坎坷，倍觉良辰美景来之不易。每闻书声琅琅，怎能不怀往事！百年树人，教泽流长。蒙承恩泽之后学，应永远铭记艰苦卓绝、百折不回之先贤。深受惠赐之诸暨人民，将永远不忘创办暨阳中学诸位贤达及其同仁创业之功。

景紫书院、大东公学和忠义中学

陈 炳 荣

清朝末年，政治腐败，外患日甚，国内有识之士开展变法维新，虽以失败告终，但废科举、兴学堂之议已潜入人心。随着省垣求是书院（今浙江大学）、绍郡中西学堂（今绍兴一中）的创立，枫桥旅居沪杭的进步人士和社会贤达，亦有仿省郡创办新学堂之议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适奉松江知府陈蓉曙丁忧返里，鉴于新学乃造福乡里，又为国家培育人才之急务，深为嘉许。次年当地名儒何蒙孙、陈达夫、楼静伟等齐集枫桥，并由各界推荐余潇湘、葛邈卿、陈时夏、潘永侯，骆绰庵、楼乐胥、陈葛亭、骆春山、陈锡麟、赵国阴等十三人组成筹备会，公推陈蓉曙为建校筹备召集人。

陈蓉曙，原名浚，又名通声，号骏公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改庶吉士。为文骏迈雄健，与当时汉学家翁同和、徐致祥、李慈铭、冯煦等并负盛名。后署松江知府，处事果断有胆识。治理松江水患，疏浚河渠三十余条；创立融斋精舍，以课学子；抑制强族，严禁赌博，境内称治。出任川东兵备道时，英商购得川东江北厅龙王洞煤矿，陈蓉曙不怕恫吓，与英商力持，最终得以收回，政绩卓著。这次返里被推为建校筹备召集人后，即择定枫桥铺前街宋代义安县治旧址，及其东侧的原“紫阳精舍”，即朱熹



陈蓉曙

讲学之处为校址，以纪念“一代宗师”、“巍巍紫阳”。众议定名为“景紫书院”。即于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由何蒙孙为主、陈达夫副之，负责修缮校舍、遴聘教师。陈蓉曙以“礼义廉耻”、“四维苟不张，富强亦何补”及“经史穷本原，努力谋建树”为宗旨，手订书院院规，以经史作为入院学生的必读课程，教学毋忘国本。所聘教师有余潇湘、楼忍安、毛颖

甫、吴春波等，皆乡间名儒，饱学秀才。入院就读学生约三、四十人，多为各村童生，年龄较大。因当时科举制度未废，所以功名思想较重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清廷下令“各州县均设小学堂”，景紫书院遂改名“景紫学堂”。所设课程有修身、经学、国文、算术、舆地、格致、体操等，后又增设英语课。时陈蓉曙服阕期满，离枫赴任。董事会公举何蒙孙为董事长、陈达夫为常务董事，为巩固学堂办学基础，发起捐献学田，使景紫学堂不断发展。

二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清廷正式下诏“废科举”，乡试及岁科童生考试均一律停罢，因而大东乡（今枫桥区）各地私塾学生要求来景紫学堂就读者日众。原有斋舍无法容纳，为顺应历史潮流，董事会以筹建“大东乡学堂”造福子孙为号召，决议拆旧署，扩建新校舍，受到大东乡各界赞同。书院创办人陈蓉曙虽已离开枫桥，仍首先解囊，认捐大洋1000元，董事长何蒙孙、常务董事陈达夫、毛家村的毛哲

夫等亦各捐大洋1000元。自此，枫桥各姓宗祠、富绅、富户以及商贾，亦纷纷认捐，有十元至数百元不等，一一记名勒石立碑于大门内。一年中，又募得学田二千余亩。时有芝菰（梓坞）山天化庵僧人也自动捐出寺田二十余亩，荐福寺和尚则捐助大批树木以支持办学。和尚捐资办学，传为美谈。学堂资金充裕，基础雄厚，建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。

新校舍占地十余亩。校门前砌照墙一座，十分壮观。楼宇宏敞，布局合理。进大门为楼屋三进，俱九间两弄，前后楼有廊庑相连，中厅为礼堂，屋顶饰以灰幔，清静明亮。楼上为师生宿舍，楼下辟为教室，采用长幅玻璃门，可随气候寒暖，自由启闭。廊柱门窗均漆成白色，使人感到肃穆宁静。庭园天井，植有桂花、芭蕉、芙蓉，两面校园植早竹数百株。正屋后北新辟大操场，其南隅有水池一方，清澈见底。岸柳飘拂，绿荫婆娑，又有古槐、丹枫，枝干嵯峨，树根盘结。此池原为南宋义安县衙内“喜雨堂”故址。学生多喜在池畔信步闲读，后填作操场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7年）校舍落成后，即命名为“大东乡学堂”。

大东乡学堂为高等小学堂，初时设四个班级，招收读过三、五年私塾的青少年，全校有学生百余名。第一任校长由董事长何蒙孙兼任，教职员十多人。不久大东乡各村先后办起初等小学四十余所，才改招初小毕业生。由于教师教学认真，学生又多能刻苦学习，所以学堂一开始就办得比较出色，深为大东乡各界人士欢迎。

辛亥鼎革后，改大东学堂为大东公学，每年招收两个班级，新生约八十余名。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教育部定高等小学学制为三年，课程设置也在原基础上作了调整，新设历

史、地理、自然、劳作等课。学堂教学制度严格，教师课堂教学认真，升级考试和毕业考试成绩不及格者，必须留级重读或不予毕业。由于教育质量较高，外乡学生也慕名而来，学堂规模逐步扩大，由原来六个班级，发展到最多时的九个班级，在校生超过三百人。当时创作校歌：“钟山之麓，枫水之阳，巍巍黉舍，屹立中央，承前启后，日月光华，莘莘学子，爱国爱家，而今而后，振我精神，毋怠毋荒，勉为完人。”启迪学生的学习自觉性。为发展教育事业，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，学校一度附设过半日制班级，名为“诸暨第七半日制学校”，并以大东公学教师为主体的大东区教育会，组织教育视察团，对全区九乡的小学，进行学习参观和考察，还发起组织大东区小学联合运动会。这些活动，对研讨学制，改进教学方法，推动学校体育运动等，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，小学实施四、二新学制，即初小四年，高小二年。是时，大东公学更名为“大东九乡联立小学”，由高等小学变为完全小学。同年九月，招收一至六年级学生，然而由于设备、师资、生源均存在问题，只办了一个学期，次年春停办初级部，只招收五、六年级的高小毕业生。随着，校名也更改为“大东九乡联立高级小学”。在课程设置上，取消了英语课。大东公学自民国元年起，至民国三十五年改为忠义初级中学止，何蒙孙先生出力殊多，至今深受人们的怀念。

何蒙孙，名颂华，号剑农，咏梅馆主，化鹿山樵。自幼饱览经史，年未弱冠中秀才，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一位教育家，其书法又名闻四方。他秉性方正，严谨，不轻易言笑，做事不苟且，廉洁奉公，生活俭朴。他由董事长兼任校长，



何蒙孙

治校三十余年，身教言传，对后人影响很大。晚年离任后，历任校长朱逸人、酈止正、楼乐胥、方劼人、崔笃甫等，又能继承优良传统。三十年代初，著名教师有楼亚亭、蔡宝仁、俞大雄、孙之铭、余任天、周祖昌等。

大东公学为当时枫桥最高学府，造就了一批英才，如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、现任农科院名誉院长金善宝；留学英国、曾任北京大学教授、杭州第一中学校长，后又出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的教育家李宗武；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、国民党“六大”代表、上海通商银行行长、《商报》社社长、工商界知名爱国人士骆清华（松）；获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学位、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、现代著名海洋学家毛汉礼；获美国杜克大学林学博士学位，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、林院科副院长，著名林学家吴中伦；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，曾任四川农学院院长，对南方水稻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水稻专家、教授杨开渠；留学美国、获加州大学博士学位，曾任天津南开大学电机系教授陈礼；留学比利时，获医学博士学位的医学家骆霖；留学日本，后任绍兴第一中学校长、浙江博物馆馆长的潘锡九；留学美国，曾任上海棉产加工处处长的植棉专家赵佰基；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，现在上海大学执教的老教授魏国霖；曾任杭州宗文中学校长、天津市政协委员、全国政协委员、民革中央常委、民革天津市主委、高级工程师陈培烈；中国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、在改造黄淮海平原中作出卓越贡

献、被全国科技界评为十大全国劳动模范的知名果树专家何荣汾；浙江大学机械系教授赵仲敏；全国特等劳动模范、著名水利工程师，枫桥征天水库工商联合企业董事长、全国人大代表梁焕木；曾任湖南平江、浙江丽水县县长、现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，知名爱国人士、逸仙书画社秘书长张紫峰（慕槎）；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，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军法官的虞炳铨；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、曾任国民革命军五十九师中将师长的陈时骥；毕业于陆军武备学堂，参加广东革命政府“东征”和“北伐”，南京政府成立后，任金陵制造局局长的陈钦。在台湾、港澳地区和海外的有：台湾糖业公司协理、诸暨旅台同乡会名誉会长王佰裕；留学意大利，曾任国民党航校机械系教官的杨济欢；台湾大学教授杨予六；台湾化工原料厂总工程师陈善鸣；美国纽约电子研究所工程师楼宝松。在台湾的知名校友尚有毛士彦、汤兰瑞、余天祥、陈吉春、汤兰亭、楼钱江、余天声、陈昌琳等；在香港的知名校友有骆肇祥等。知名校友中尚有潘炳天（德国留学）、毛少林（日本留学）、葛琪升（法国留学）、潘锡明（苏联留学）等等。

三

忠义中学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诸暨在沪、杭各地师生，不原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任教就读，纷纷回乡，失学青年日益增多。枫桥教界人士潘锡九、陈仲礼、赵君方、何植三、骆顺荪等聚会枫桥镇，共同商议自力更生创办初级中学。此举得到枫桥各界和地方政府的支持。乃于是年冬，借用大东公学部份校舍，筹备“补习中学”。自愿任教的教师有发起人赵君方、潘锡九、何植三，尚有在乡教师屠佰和、周绍旦、赵可